

[专家特稿]

我国劳动力结构的演变及其影响研究^{*}

李长安, 李 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之一,其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刻影响。本研究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合改革开放后以往人口普查数据和分年度人口数据,分析了我国劳动力结构的演变规律及可能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40余年来,我国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开始面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抚养负担加重、劳动力地区分布不均等问题,由此引致了消费需求、储蓄率、投资需求等降低的不利影响。但同时,劳动力结构变化也带来一定发展机遇,包括倒逼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素质普遍提升、劳动工资水平持续提高等。研究认为,在“十四五”及未来更长的时期里,应抓住劳动力结构变化带来的机遇,主动迎接挑战,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关键词】人口普查;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结构;高质量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21)05-0001-11

一、引言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及以往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总量一直保持适度增长,但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相比2010年减少了6.79个百分点,占总人口的63.35%,为89,438万人。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年度数据的变化趋势看,我国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甚至出现短缺的趋势日渐明显。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也是人口构成的主体,其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深刻影响。蔡昉指出:人口红利期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按照定义,“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可以继续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同时对第二次人口红利进行开发^[1]。都阳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期较短,并行将进入人口负债期,这与我国的生育率降低较快有极大关系^[2]。高建昆指出,在劳动力供给方面,死亡率的率先下降导致劳动力供给短暂增加,而生育率的随后降低则导致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由过剩转为短缺^[3]。

^{*} [收稿日期] 2021-07-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就业扶贫的机制、效应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8AJL01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YQ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长安(1969—),男,江西南丰人,经济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李艳(1994—),女,山东东营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

人口老龄化是劳动力的有效供给逐渐短缺的原因之一。Ransom 和 Sutch 发现,美国从 1887 年起劳动参与度明显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退休老人的增多^[4]。张鹏飞研究发现,由于老龄化等因素,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将呈现下降趋势,即便已经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该政策在劳动力供给回升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有限^[5]。刘家强的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劳动力供给短缺、劳动生产率下降等诸多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将不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6]。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源的质量也有负向影响。Pampel 和 Weiss 的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年龄较小的工人比年龄较大的工人更具竞争优势,老年工人在达到退休年龄后被强制退出劳动力市场^[7]。

本研究以我国劳动力结构的演变为主题,利用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并结合改革开放后以往人口普查数据和分年度人口数据,研究我国劳动力结构的演变规律,并分析其可能带来的影响,以期在“十四五”期间及未来更长时期,能够更好地把握劳动力结构变化带来的机遇,主动迎接挑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目标。

二、中国劳动力结构的演变趋势

(一) 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态势

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为女职工 50 周岁(女干部 55 周岁)、男性 60 周岁。因此按照实际国情,在考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时,主要分析我国 15—59 岁人口的变化情况。本研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及每年的人口抽样数据绘制了我国历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及增长率统计图(见图 1)。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方面,1982—2011 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呈增长态势,1982 年 15—59 岁人口为 59,002 万人,到 2011 年扩大到 94,177 万人,增长了 59.6%。2012 年起,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下降,正式进入负增长阶段,到 2020 年已降至 89,438 万人,比 2011 年下降了 5.0%,其中 2020 年下降幅度最高,比 2019 年下降幅度高出 2.41 个百分点。总的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依然庞大,但数量已持续 9 年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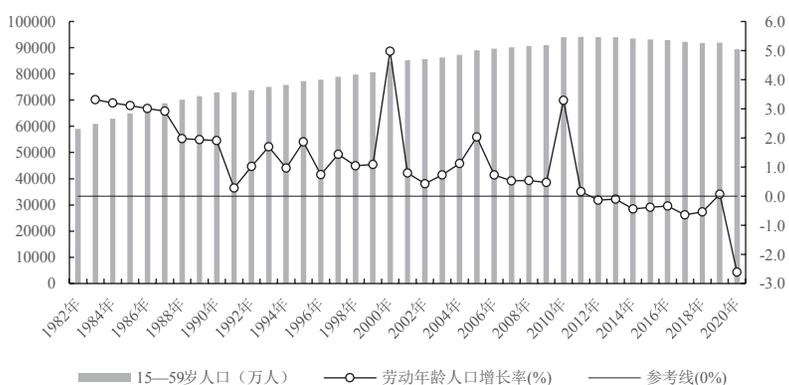


图 1 1982—2020 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化与增长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以往人口普查数据、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部分年份由于数据缺失经推算得出,2020 年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告》整理。

具体分年龄段来看,研究统计了 1982—2020 年 0—14 岁人口、15—59 岁人口、60 岁及以上人口占当年总人口的比重(见图 2)。三个年龄段人口从比重上来说,15—59 岁人口占比始终最大;2016 年及以前年份,0—14 岁人口次之,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最小;2017 年起,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0—14 岁人口。0—14 岁人口一般称为少儿人口,1982—2010 年其比重一直在较快下降,从 1982 年的 33.6% 缩小到 2010 年的 16.6%,下降了 17 个百分点,此后 10 年该比重有小幅上升势头,到 2020 年增加到 17.9%。15—59 岁人口比重在 1982—2010 年呈波动增加态势,2011 年起开始不断

降低, 到 2020 年已从 2010 年的 70.1% 下降到 63.4%, 仅高出 1982 年 4.6 个百分点。从占比上讲, 劳动年龄人口回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平。60 岁及以上人口一般称为老年人口, 而老年人口比重自 1982 年起始终呈上升趋势, 到 2020 年, 已从 1982 年的 7.6% 上升到 18.7%。值得注意的是, 在不同年龄人口占比变化过程中, 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差值越来越小, 特别是从 2017 年起, 老年人口反超少儿人口。可见, 老年群体占比越来越高,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加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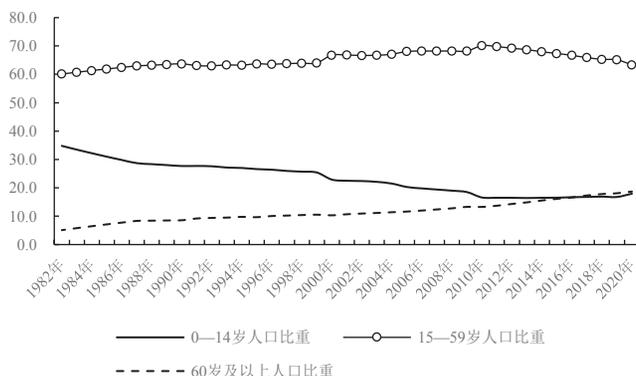


图 2 1982—2020 年三个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单位: %)

数据来源: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

(二) 劳动年龄人口内部出现明显的老化趋势

劳动年龄人口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研究将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分成 15—24 岁、25—44 岁、45—59 岁三个年龄段进行分析, 计算各年龄组人口占 15—59 岁人口的比重。图 3 显示, 三个劳动年龄组人口的比重排序前后变化相对较大: 25—44 岁年龄人口一直是占比最大的人群, 但与 45—59 岁人口的差距不断缩小, 到 2019 年, 两个年龄组比重已相差不到 10 个百分点; 1998 年以前, 15—24 岁年龄组人口占比高于 45—59 岁年龄组人口占比, 此后, 45—59 岁劳动年龄组人口反超 15—24 岁年龄组, 占比位列第二。分开来看: 15—24 岁年龄组人口比重整体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1982 年到 1987 年经历了短期的上升, 此后一直波动下降, 1982 年占比 33.9%, 到 2019 年下降到 16.5%; 25—44 岁劳动年龄组人口比重也呈先波动上升、后波动下降态势, 1998 年达到最大值 53.7%, 将近 40 年间比重一直稳定在 50% 上下, 但从 2016 年起比重又出现小幅下降趋势; 45—59 岁年龄组人口比重总体上一直在波动上升, 从 1982 年的 20.7% 上升到了 2019 年的 37.0%, 已成为劳动年龄人口的第二“主力”, 与 25—44 岁年龄人口差距不断缩小。由此可见, 我国高龄劳动力占比不断增高, 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趋势不断加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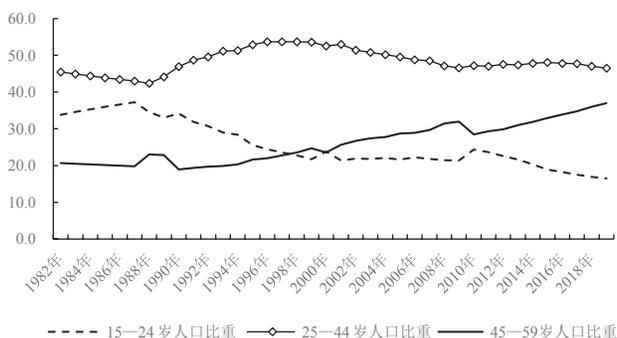


图 3 1982—2019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构成 (单位: %)

数据来源: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 部分年份由于数据缺失经推算得出。

（三）劳动力素质大幅提高

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之一，人口和劳动力素质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1964年我国文盲率为33.6%，随着1977年恢复高考，1982年文盲率下降到22.8%；到2020年，文盲率已降至2.7%，较1964年下降30.9个百分点。1982年我国每10万人具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615人，到2020年增长至15,467人，是1982年的25倍多，较2010年的8930人也翻了将近一番。2010年到2020年10年间，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了将近一个年级的程度，由9.1年上升到9.9年，相当于由初中毕业水平提高到接近高一水平。由此可见，我国人口素质较40年前已有了较大提高。

对比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4年的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见图4），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变化趋势。就业人员中，2000年未上过学的比例为8.1%，到2015年已降至2.9%，下降了5.2个百分点，仅为2000年的35.9%。整体上，受过小学、初中教育的就业人口占比也在下降，相反受过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教育的就业人口占比在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我国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值得一提的是，受过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占比变化。2015年，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就业人口占比为6.2%，接近2000年的5倍；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就业人口占比扩大为0.7%，约是2000年的7倍。受过大学专科教育的占比上升也非常显著，2015年已是2000年的两倍多。以上数据体现出的我国人口及劳动力素质的巨大飞跃，为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进步、科学技术创新等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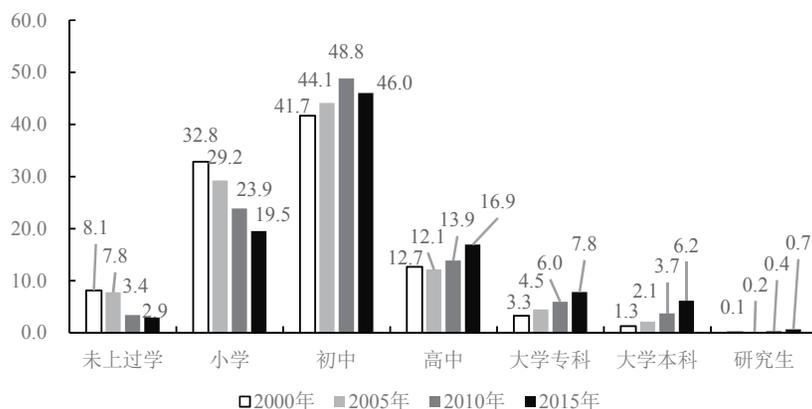


图4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全国就业人口受教育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及2005年、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整理。

（四）劳动力流动的规模逐渐缩小，且方向发生变化

在流动劳动力中农民工占据主体地位，因而从外出农民工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的整体变化情况。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见表1），本地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比重不断升高，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比重不断减少^①，这意味着选择留在本地工作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外出农民工占比10多年来持续下降，从2008年到2020年，下降了将近3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增长率不断下降，2020年出现负增长趋势，较2019年减少了466万人。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在乡务农、回乡就业创业，是因为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的大力实施，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增多。

^①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表 1 2008—2020 年农民工总量及构成

年份	农民工总量			构成			外出农民工 增长率 (%)
	本地农民工 (万人)	外出农民工 (万人)	总计(万人)	本地农民工 (%)	外出农民工 (%)	总计 (%)	
2008 年	8501	14,041	22,542	37.7	62.3	100.0	—
2009 年	8445	14,533	22,978	36.8	63.2	100.0	3.5
2010 年	8888	15,335	24,223	36.7	63.3	100.0	5.5
2011 年	9415	15,863	25,278	37.2	62.8	100.0	3.4
2012 年	9925	16,336	26,261	37.8	62.2	100.0	3.0
2013 年	10,284	16,610	26,894	38.2	61.8	100.0	1.7
2014 年	10,574	16,821	27,395	38.6	61.4	100.0	1.3
2015 年	10,863	16,884	27,747	39.2	60.8	100.0	0.4
2016 年	11,237	16,934	28,171	39.9	60.1	100.0	0.3
2017 年	11,467	17,185	28,652	40.0	60.0	100.0	1.5
2018 年	11,570	17,266	28,836	40.1	59.9	100.0	0.5
2019 年	11,652	17,425	29,077	40.1	59.9	100.0	0.9
2020 年	11,601	16,959	28,560	40.6	59.4	100.0	-2.7

数据来源: 根据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整理。

劳动力流向方面, 本研究对东、中、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和港、澳、台及国外地区的农民工输入、输出情况进行了整理统计(见图 5)。从输出地看, 2020 年农民工输出总量东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西部地区 > 东北地区。2015—2019 年, 东部地区输出农民工稳定在 10,400 万人左右, 其他三大地区输出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 2020 年各地区输出农民工数量均减少。在增速上, 各地区增速近年来都呈下降趋势, 到 2020 年全部出现负增长, 其中东部地区下降最多, 占全国输出农民工下降总量的 56.5%, 中部地区次之, 占 33.3%, 东北地区下降速度最快, 与 2019 年相比减少了 3.6%。从输入地看, 2020 年农民工输入总量东部地区 > 西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东北地区 > 港、澳、台及国外地区, 其中东部地区农民工输入量占总输入量的 50% 以上。2015—2020 年, 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农民工输入数量先上升后下降,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持续上升, 港、澳、台及国外地区除 2020 年外一直在持续增加, 2020 年下降幅度较大, 较 2019 年下降了将近 20%, 当然这与新冠肺炎疫情关系较大。在增速上, 2015—2019 年, 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增速均放慢, 中部地区增速较稳定, 港、澳、台及国外地区增速上有上升趋势, 2020 年各地区增速全部下降。

从各地区输出与输入的对比上看, 东部地区输入量大于输出量, 2020 年输入量是输出量的 149.5%, 其他三大地区输入量均小于输出量。研究计算了东部地区输入量与输出量之比及其他三大地区输出量与输入量之比(见图 6), 可以发现: 东部地区输入量与输出量的比值在不断下降, 相对输入率减小; 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输出量与输入量的比值也不断减小, 两地区相对输出率都在降低; 东北地区的比值不断上升, 这意味着东北地区相对输出率不断变大。这反映出: 与中西部地区相比, 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优势在缩小; 广大中西部地区在区域振兴计划的指导下,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大成绩; 东北地区的重振雄风任重而道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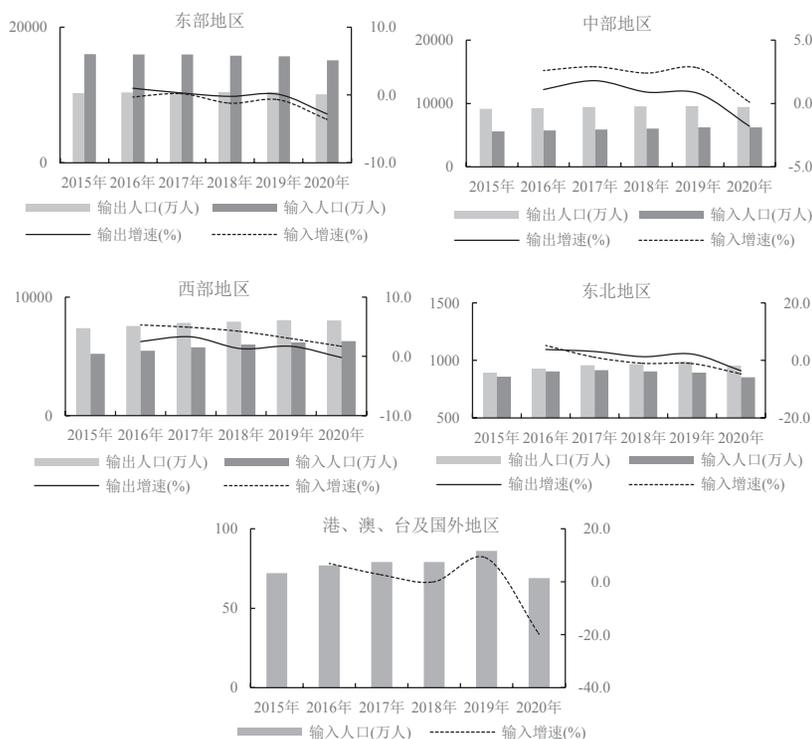


图5 各地区输出、输入农民工及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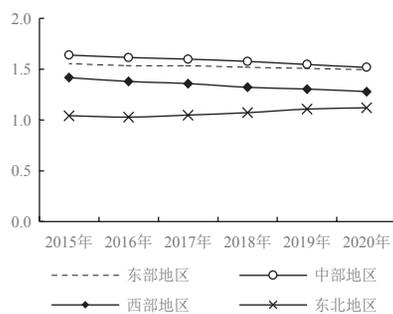


图6 各地区输出量与输入量之比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整理。

注：东部地区 = 输入量 / 输出量，其他三大地区 = 输出量 / 输入量。

三、劳动力结构变化可能带来的冲击

(一)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经济学中人口红利期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消费增加、储蓄减少、国家预算和养老基金负担减轻的阶段^[8]。随着人口红利期的消逝，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劳动供给短缺风险，且社会抚养压力加大，劳动力队伍呈老化趋势，对储蓄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产生向下压力，流动劳动力面临着社会融合问题，人才分布在地区间也不够均匀。

1. 劳动力供给面临短缺风险

近10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占总人口的比重都持续下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2020年的下降速度更是显著加快。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实际上来源于社会经济活动人口，可以用各年龄段经济活动人口比上各年龄段总人口得出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分布情况。观察图7的各年龄段劳

动参与率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年龄段是25—44岁,从45岁开始逐年龄段降低,且各年龄段间差距比较明显。结合图3可知:25—44岁人口占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已经有了下降迹象,但这一年龄段也是各年龄段中劳动参与率最高的时期;45—59岁人口占总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逐渐上升,不过从45岁起劳动参与率逐年龄段开始明显下降。两方面加总下,劳动力供给短缺的风险便有迹可循了。根据童玉芬等统计,虽然当前我国劳动力需求规模在缩减,但其下降速度小于劳动力供给的下降速度^[9]。长此以往,我国劳动力需求量将反超劳动力供给量,劳动力供给面临着潜在短缺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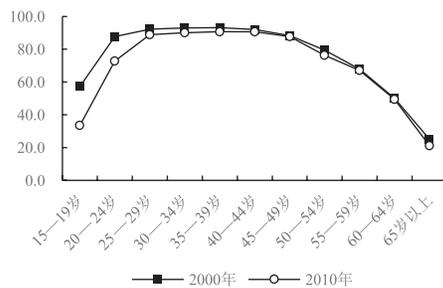


图7 劳动参与率分年龄分布情况 (单位: %)

数据来源: 根据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其中2010年15—19岁劳动参与率以16—19岁劳动参与率代替。

2. 抚养负担增大

人口总抚养比可以反映当前社会抚养负担大小,由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构成,在本研究中由0—14岁年龄人口与6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之和除以当年劳动年龄人口得出。在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期^①,由于严格的生育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并达到极低的生育水平。此时正处于总抚养比较低的时期(见图8),且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加。以总抚养比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迅速的时期也是抚养比下降最迅速的时期^[10]。适宜的人口结构无疑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目前,整体上看,虽然少儿抚养比较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明显减小,但近年来又有了增加趋势,且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老年抚养比持续增加,总抚养比先下降后上升,2020年增速更是显著加快,总抚养比上升到57.9%,接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总的来看,现阶段总抚养比回升,社会抚养压力逐渐变大,加之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绝对数量均有所下降,第一次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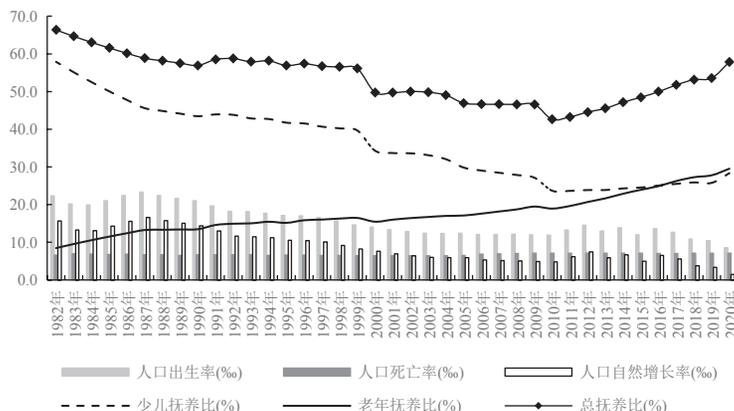


图8 抚养比、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整理, 部分年份抚养比数据缺失经推算而得。

① 参照蔡昉的表述, 本研究把过去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高, 因而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形成高储蓄率的人口结构优势时期称作第一次人口红利期。

（二）劳动年龄人口老化将对消费、投资等产生影响

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45—59岁人口成为劳动年龄人口的最大“主力军”已不再遥远。25—44岁年龄组人口代表的是中青年群体，是劳动力市场上最为活跃的因素，这一阶段的劳动者体力最旺盛、最具发展潜力，劳动参与率也是各年龄段中的最高的（见图7）。高龄劳动力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人脉关系，工作技能较中青年劳动力也更加娴熟，无疑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11]。但有研究表明，劳动力老龄化不利于一国经济的发展，如果45岁及以上劳动力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的话，这一影响将会加剧^[12]。高龄劳动力的体力逐渐减弱，头脑不再像中青年时期那样灵活，学习与研发能力也在减弱，且劳动年龄人口老化还会通过影响储蓄率、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等对经济增长起到负向作用。许多研究发现，当一国人口抚养比上升的时候，将会产生抑制储蓄增长的不利作用。比如Meredith就发现，无论老年抚养比上升还是少儿抚养比上升，都会使储蓄率减小^[13]。在消费需求方面，一般认为老年人口与青壮年人口相比，消费需求要低许多。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同时老龄化程度提高，将不利于社会总消费的增长。不仅如此，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对投资也会产生明显的冲击。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储蓄等于投资，若对储蓄率负向影响较大，间接地也会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就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整体的下降趋势而言，新增劳动力的减少不仅直接降低了所需新设备和新设施的投资，而且所引发的经济增长放缓将进一步削减国内投资需求。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由于资本对劳动力具有替代效应，劳动力减少将要求增加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研究表明，由后者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效应无法抵消前者带来的投资需求下降程度^[14]。故而，目前来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对投资需求的负向影响要更大一些。综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老化趋势将严重抑制国家经济发展活力。

（三）劳动力流动面对社会融合难题

目前来看，虽然劳动力流动规模缩小，方向也在发生变化，但劳动力流动依然频繁。为了追求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更高的工资水平或更好的教育环境，劳动力大多流向东部地区，2020年东部地区农民工输入量占各地区总输入量的53.0%，这也从侧面说明当前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够均衡，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水平等依然有较大差距。与大量劳动力流动伴随出现的必然是社会融合问题，跨地区流动时户籍制度阻碍、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依然存在，也导致流动人口在许多方面的需求难以像当地人口一样得到有效满足，比如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这将不利于流动劳动力的发展。高学历人口也是流动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在高等学府的分布上，经济较发达地区大学较多，且教学质量较高，吸引了较多人才毕业后留在当地或去经济更发达地区发展；另一方面，在各地区开始的人才争夺战中，经济发达地区给予人才的待遇更高，落实方面也较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更优，更能留住人才。各地区人才分布不均问题越来越严重，一定程度上会对缩小地区间差距产生负向影响，不利于各地区均衡发展。

四、劳动力结构变化可能带来的机遇

（一）倒逼技术进步，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

劳动力人口老化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必然结果。都阳和封永刚的研究表明，只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时，我国的经济增速在2020—2025年平均每年将减少1.07个百分点^[15]。那么，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面对劳动力减少的挑战，以技术取代人工成为企业的现实选择。我国机器人使用的普及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使用机器人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二）更加重视人才培养，促进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在劳动力数量不断缩减的情况下，努力提高劳动力素质，是以质量取代数量、以“素质红利”

替代“人口红利”的必要途径。2010—2020年10年间,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提升了将近一个年级的程度,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不到10年上升到10.8年^[6],相当于由接近高一水平提高到接近高二水平,劳动力素质显著提高。到“十四五”末期,即2025年,国家力争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相当于高二年级以上。不仅如此,我国还拥有一支数量众多的掌握一定技能的熟练劳动力队伍。人口及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升,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劳动力数量上的不足。

(三) 推动劳动报酬不断提高, 就业质量逐步改善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近年来不断下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给侧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资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本研究统计了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工资水平,以及每年的平均货币工资指数,其中平均工资为名义工资,来观察工资水平的变化(见图9)。可以看出工资水平持续增长,且增速总体较为稳定。2020年平均工资额为97,379元,是1978年的158.3倍,较2010年也翻了一番多。与此同时,劳动者的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工作环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就业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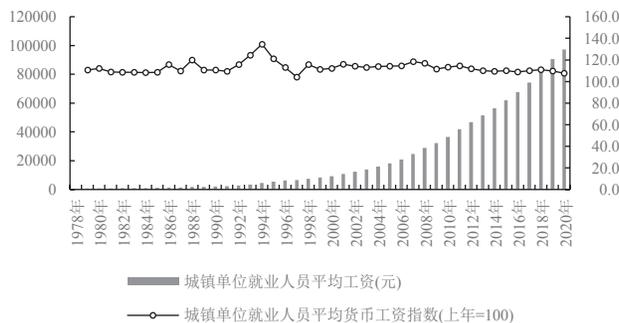


图9 1978—2020年人均工资水平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劳动力队伍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抚养负担加重、流动劳动力社会融合困难、人才各地区分布不均等问题,也引致了消费需求、储蓄率、投资需求的降低。当然,劳动力结构的演变也可能带来一些机遇,如倒逼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加重视人才培养、推动劳动报酬提高等。在“十四五”期间及未来更长的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有所增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任务艰巨。针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必须紧紧抓住机遇,主动迎接挑战。为此,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一) 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步伐

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劳动力供给数量也正在减少,在此背景下,若要维持经济长期增长,必须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使其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第一,大力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这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以提高国家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取得社会的积极响应,带动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继续支持和鼓励创新。创新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第三,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要内容。这就需要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通过补贴等支持方式促进对核心基础零部件等的开发。第四,不断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的环境。若要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着力营造充满活力和竞争力,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成长和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以上几点措施将能够有效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二) 稳妥推进延迟退休, 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潜力

应对劳动力短缺风险的另一个方法是促进高龄劳动力的再就业, 增加社会经济活动人口。目前,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45—59岁人口已成为第二“主力军”, 但这一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 且幅度很大。一方面高龄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增加, 另一方面高龄劳动力不参与经济活动的占比升高, 两相结合, 将使经济活动人口下降更多。因此, 通过延迟退休或实行弹性退休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鼓励企业开发老年劳动力等促进高龄劳动力再就业的政策, 将有效提高高龄劳动力劳动参与率, 缓解劳动力供给下降的局面。老龄化政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退休后“施与受”的养老保障服务过程, 还应把老龄政策制度设计的年龄周期往前移, 把被动的老龄化政策导向转变为主动的, 从职业生涯的中后期开始提前介入, 让更多相对年长者主动参与到社会创新、创业、创造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来^[17]。

(三) 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 促进人才均衡分布

推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提高人口及劳动者素质, 促进现有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是解决当前劳动队伍面临问题的根本方法。应大力推进教育公平, 不断提高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同时重视职业教育发展, 加强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开展针对失业人员与仍具备就业能力的已退休高龄劳动力的培训, 使他们掌握新知识、新技能, 促进这两类群体再就业。在人才引进上, 应给予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多财政补贴以吸引人才流入, 还要注重对人才待遇承诺的切实落实。

(四) 完善流动劳动力相关社会融入政策, 引导人才有序流动、均衡分布

面对我国流动劳动力如此庞大的大环境, 针对流入人口的相关政策也要完善起来, 以促进流动人口发展。应适当放宽户籍制度, 对满足一定要求的流动人口准予落户; 重视未落户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 避免与原住居民子女区别对待; 在流动人口住房问题上, 适当给予补贴, 避免漂而不落、流而不迁、迁而难居的现象大量出现; 提高针对流动人口的医疗及社会保障水平。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人才分布不均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 要通过人才引进、外资引入、给予当地企业一定税收补贴等政策来继续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争取早日实现各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

【参考文献】

- [1]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J]. 经济研究, 2010(4): 4-13.
- [2] 都阳. 人口转变、劳动力市场转折与经济发展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0(6): 136.
- [3] 高建昆.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J]. 当代经济研究, 2012(4): 63.
- [4] RANSOM R L, SUTCH R. The decline of retirement in the years before social security: U. S. retirement pattern, 1870—1940 [C]// RTCARDO-CAMPBELL R, LAZEAR E. Issues in contemporary retirement.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3-37.
- [5] 张鹏飞. 全面二孩政策、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 [J]. 经济经纬, 2019(3): 140.
- [6] 刘家强. 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新常态的传导机制 [J]. 探索与争鸣, 2015(12): 15-18.
- [7] PAMPEL F C, WEISS J A. Economic development, pension policies, and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aged males: A cross-national, longitudinal approach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3, 89(2): 350-372.
- [8] 巴尔苏科夫.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老龄化: 系统性转型的世界趋势 [J]. 张广翔, 师成, 译. 社会科学战线, 2021(4): 218-228.
- [9] 童玉芬, 刘志丽, 宫倩楠. 从七普数据看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变动 [J]. 人口研究, 2021(3): 69.
- [10] 都阳. 正确理解中国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 [J]. 人民论坛, 2019(14): 70.
- [11] 童玉芬, 廖宇航. 银发浪潮下的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0(2): 30.
- [12] FUTAGAMI K, NAKAJIMA T. Population aging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1, 23(1): 31-44.
- [13] MEREDITH G. Demographic change and household saving in Japan [M]// MEREDITH G, BAUMGARTNER U. Saving behavior and

the asset price "bubble" in Japan.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5: 36-45.

[14] 骆立云. 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一个初步的文献综述 [J]. 金融评论, 2013 (4): 106.

[15] 都阳, 封永刚. 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J]. 经济研究, 2021(2): 71.

[16] 梁丹.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 十年来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 [N]. 中国教育报, 2021-05-12(01).

[17] 刘艳飞, 胡晓辉. 积极老龄化下的银色创业实践及可行性——基于 CFPS (2010—2018) 的实证研究 [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1(3): 12.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of China's Labor Force Structure

LI Changan, LI Yan

(*School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A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of economic growth, labor force and its changes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and combined with the previous census and annual population dat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labor force structure and its possible impacts. The study finds tha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China's labor force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which has begun to face problems such as a decrease in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increased support burdens,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labor in regions. This has led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f reduced consumer demand, savings rate, and investment demand. However, changes in the labor structure have also brought certain developmental opportunities, including forc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labor productivity,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labor quality, 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labor wage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beyond, we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changes in the labor force structure,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and achieve more adequate and higher-quality employment and sustaine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Key words: census; working-age population; labor force structure; high-quality employment

[责任编辑: 孙 蕊]